

LI SHI ZHE XUE YIN LUN

历史哲学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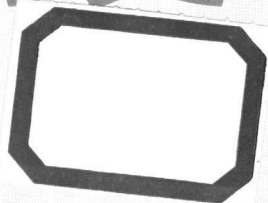
张耕华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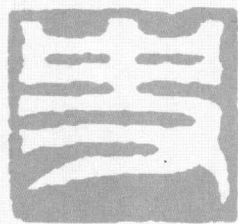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出版社

L I S H I Z H E X U E Y I N L U N

历史哲学引论



张耕华 /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哲学引论/张耕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11

ISBN 7-309-04238-7

I. 历… II. 张… III. 历史哲学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9658 号

历史哲学引论

张耕华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史立丽

装帧设计 陈 萍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2.5 插页 1

字 数 198 千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4 000

书 号 ISBN 7-309-04238-7/K·135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历史与理论

何兆武

当代实践的历史学家们往往习惯于“低头拉车”而不习惯于“抬头看路”。这里的前提假设仿佛是说：结论是早已经摆好在那里的了，历史学家的任务，无非就是为它再一次地补充上一份例证而已。你能填充一项例证，就算是作出了一分成绩，你能补充两份例证，就算是作出了两分成绩。正有如诸葛大丞相在“空城计”中的名言：“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劳心。”这种为学的态度乃是经学的态度，《圣经》里面每提到一桩事件时，往往总是要强调“这就应了经上的话”云云。原来真理早在经上都有了，人们所见证的事实无非是为经上的真理再一次地提供一个例证而已。自来经学家的神圣职责无非就在于代圣贤立言、弘扬经义，而绝不可以对经义本身加以反思乃至拷问。然而真正的科学或哲学则恰是要对历来的经义不断地加以反思、质疑和拷问。实验、数据、资料 and 思想理论，双方永远是相互作用并相互促进的。

如果学术的目的是在于追求真理，而不仅只是要弘扬经义、代圣贤立言，那么学者就不应该单纯局限于找材料来充实自己的观点，而应该同时不断地反思并批判自己所据以立论的根据。这里的“批判”一词是指它 18 世纪的原来意义，即学者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上经历一番逻辑的洗练或自我批评，借以检验自己立论的可实证性（或可证伪性）。任何学术思想，凡是不经过一番批判的洗礼的，都只能是一种经学的信仰，而不可能是一种科学的论证。

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是通过一套伦理道德的教诲所传承下来的，即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其目的并不在于通过知识去寻求真

理,而是以事例进行说教,引导人们更好地去实践某种伦理价值(如忠君、爱国)。一直要到20世纪之初,史学界才开始自觉地开展一场史学革命,即所谓“新史学”的出现。新史学的登场对于传统的经学说教,确实有一番摧陷廓清之功,使人们的思想认识焕然一新,不再拘守在陈腐的说教束缚之下。到了五四时期,新的历史学已经从传统的政治伦理说教之下解放出来,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学术有其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它不再单纯是神学说教的女仆,为某种流俗的利益服务。但是五四运动在其理论方面也不免有其局限。当时的学术思想大抵是在西方19世纪实证主义思潮的大气候之下进行的,而以历史学尤甚。它力图把历史学拉到朴素的事实的层面上来,但事实本身却并不构成其为历史学。历史本身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实证的,尽管它并不排斥自己有其实证的一方面,然而归根到底,它在其本性上并不就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也不可能把自己限定在实证的范围之内。证据或史料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乃是掌握了这些材料的人。

自然科学的研究以自然世界为其对象,自然世界本身是客观的,研究者设定它是没有思想、意志或感情的,所以并不用考虑其间有任何的人文动机。然而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人文世界,它彻头彻尾贯穿着人们的思想、意志和感情。故而历史的研究方式就不可能简单地等同于对自然世界的研究方式,尽管它也要利用自然科学的某些操作方式,如对某些古物的成分与年代的鉴定,为某些社会现象建立数量化模型等等。人们总是习惯于说:事实就证明了什么什么。但是事实本身并不能进行论证,进行证明的乃是使用这些材料的人。而任何人都是为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所制约着的,因此就没有通常意义上那种所谓的客观。即使是人人都有目共睹的,也并不就意味着客观。例如,彩虹是人人看到的,但它并没有客观存在。自然现象尚且如此,人文现象就更加微妙得多了。历史就其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不可能不是与自然世界的必然律相一致的这一方面而言,它是不会脱离或者是违反自然世界的,故而也要服从自然界的必然规律。但是人文世界是人的创造,而不是(或不单纯是)自然的创作,或者借用一位哲学家的话来说:历史乃是自由人所创造的自由的事业。因而它就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或者,我们不妨使用一种形象的说法:历史的轨迹是在这样一个坐标上运行的,这个坐标系的两个轴,一个代表着物质世界的必然,另一个则代表着人文精神的自由创造。因此,历史本身的运动轨迹就具有两重性,

它是受这两者共同制约的结果。或者也可以把历史比作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它的走向乃是这一平行四边形两边合力的结果。所以历史学的研究,一方面是要探讨历史行程之必然的、不以人的精神作用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但同时另一方面就要探讨历史行程之中那些非必然的人文动机的作用。因而,不但历史本身有其两重性,历史学本身也有其两重性。于是,这里就是一阕两个两重性的“两重奏”。未能够明确地理解这一点,正是导致以往大多数历史学家在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上未达一致的原因。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无思想意识的自然界(有人认为原子也有自由意志,另当别论),所以它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则恰恰是人文动机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历史,人文世界本身乃是人文动机在起作用的产物。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的客体抑或是研究的主体,都彻头彻尾地在贯穿着人的意志和愿望。既然人的主体性始终贯穿于其间,所以它就始终是受着人的意志的影响的。在这种意义上——而不仅仅是在“事在人为”的意义上——它同时也就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任何学术总是材料与理论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结合而发展的。理论不可能毫无事实的根据,对事实的理解也必然促进理论不断深入。双方都不可能在原点上停滞不动。我们今天的认识应该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之前我们那些前辈了。当然,我们也还是站在他们肩上才超越了他们的。过去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习惯于旧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探讨方式,往往满足于沉浸在成堆的史料和现成给定的思想体系之中,而从不萦心于自己所由以出发的思想的前提假设的条件及其局限性(或者说,它的有效性范围的界限)。这种盲目往往会导致人们钻之愈深则失之愈远。史家在自己对待历史世界的态度上,也必须既是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即既须入乎其内深入探索史实的真相,同时又能出乎其外随时反思并批判自己是如何理解历史世界的,亦即它的有效性的范围和程度究竟如何。正如一位航海家在大海之中是要时时刻刻调整着自己的方向的,而并非是罗盘一旦定了向,就可以一劳永逸永远地勇往直前了。一项史实是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的,但是我们对它的认识却是永远在不断深入和永远不断在改变着的,从而我们对它的解读(也就是我们的思想)也是不断在改变和更新的。没有丰富的资料发掘作为依据,我们对历史的理念就会是空洞的,而没有深刻的自我反思,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是盲目的、武断的。这一点对于

许多传统的实践历史学家来说似乎是一件言之匪艰、行之唯艰的事。一种学术风尚一旦形成了一种舆论的气候,虽有豪杰之士往往也难以从其中脱身,更谈不到要力挽狂澜了。不过对这一点也不必过于消极。一方面,一个时代的大潮固然是个人所难以抗拒的;但是另一方面却也要看到事在人为。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学是历史学家所创造的。颜习斋不是就说过吗:“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以气数,一入行之谓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理性不是不可以战胜盲从的,批判不是不可以战胜信仰的。这就又回到了上述的两重论:历史创造人,人也在创造历史。历史学家就是在这样一阙“两重奏”之中不断前进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人文科学近年来也呈现出某些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和新思路。史学思想和理论正在经历着一番更深层次的新的反思,尤其是有一批中青年的专业历史学家正在从事于历史理论与历史学理论更深层次的探讨。人们常常要问:人生有什么意义?史家也往往要问:历史有什么意义?如果有意义的话,那意义也不是客观世界先天给定的,而是要待到人们探索之后才给定的。这便是通常所谓的历史哲学。凡是未能对此作出答案的,可以说都未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对历史本身作出答案的,可以说是历史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对历史学本身作出答案的,则是历史哲学中的认识论。以中国悠久的历史学中的优良传统与现代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操作方法相结合,我们可以期待着我国历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局面。不先批判地认识历史学本身的性质,又怎么可能认识历史呢?

华东师大张耕华先生最近以他多年钻研的心得撰成《历史哲学引论》一书,深入探讨了历史和历史学的本性及其认识论的问题。承耕华先生不弃,于书成之后赐寄一份给我,使我先睹为快。我深恐未能很好地体会作者的原意,遂拉杂写出自己读后的随感如上,以就教于耕华先生和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道。

2004年9月
北京 清华园

引言

哲学家科利曾说：“在最近的20年中没有任何一门人文科学像历史学那样在其本身方法论方面进行了如此彻底的再思考。”^①科利的这一番话，针对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西方史学理论界的一般状况，借用科利的话来概括又一个近20年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上的变化，倒也是合适和贴切的。只是史学理论研究上的一些变化，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研究的影响，似乎是微乎其微的。理论研究者与一般学者之间难以交流沟通，恐怕是中外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一般的历史学者认为，史学理论的这种研究，有故弄玄虚之嫌，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甚至是人为地把问题复杂化。而理论学者则像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所表达的那样：大多数的历史学家还没能走出康德所说的“教条式的昏睡”，他们没能意识到自己学科里的问题^②。这种沟通、交流上的隔阂，就中国史学界而言，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好像也未见得有什么改观。

本书所要讨论的是有关历史学的问题，而不是历史的问题。不过，这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因为讨论历史学的问题，总是会牵连到许多历史的问题；反之，讨论历史的问题，也总是会碰到有关史学的问题。比如我们讨论历史学的规律理论，它的前提就是历史本身存在着规律，如果历史没有规律，那么我们的规律理论及体系只能是空中楼阁。这样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称之为“历史哲学”。但是，有关历史的理论探讨与有关史学的理论探讨，毕竟不是一回事，在具体的研讨中，仍有进一步区分的必要。所以，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最先提出了一对新术语：把讨论历史理论问题的，称之为“思辨的历史哲学”；把讨论史学理

① 科利著，李幼蒸译：《哲学主要趋势》，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40页。

② 雷蒙·阿隆著，冯学俊、吴泓缈译：《论治史》，三联书店，2003年，第29～30页。

论问题的,称之为“批判的历史哲学”^①。前者是指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等学者的研究,后者是指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学者的研究。20世纪以后,亨佩尔、威廉·德雷、海登·怀特等学者虽然也是以史学理论为研讨对象,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与狄尔泰等学者有所不同。为了加以区别,又出现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一词,用来专指历史哲学向“语言学”转向后形成的一种研究路数。不过,习惯上我们常常将这两者统称为“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本书的讨论大体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相当。虽然沃尔什的划分为后来的学术界所接受并沿用,但“历史哲学”这一术语已经为大家熟悉和习用,如沃尔什的著作虽然讨论史学问题,而书名仍称《历史哲学——导论》,威廉·德雷的著作也题名为《历史哲学》。

在中国史学理论界,相关的名称术语还未统一,有关前者的,有“历史的形而上学”、“历史本体论”、“史学本体论”、“历史的哲学”、“历史理论”等;有关后者的,有“历史学的知识论”、“历史学的哲学”、“历史认识论”、“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理论”等。其中,“历史认识论”一词,使用得较为广泛。

“历史认识论”,顾名思义,就是有关历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它的最终成果,就是一种史学观。“历史认识论”也可以表示理论研究的特殊视角,即以认识论的方式来研讨史学问题,这实在也反映了近30年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实际。就笔者所见材料来看,采取认识论的视角来研讨史学问题,主要是中国和前苏联学者的研究路数,而西方学者大多是采用科学哲学的视角。这两种研究路数,各有千秋,也各有利弊。科学哲学的问题意识突出,论域清晰。只是按照笔者的理解,历史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学科,它几乎囊括了我们所有的认知形式 and 知识品种,如史实的确认、史事的理解、历史规律的概括、历史意义的评价等。这些不同的认知形式生产不同的知识产品,体现不同的学科属性。所以,历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并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史学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哲学也不可相提并论。前者比后者所涉及的问题更多,也更复杂。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哲学的视角还是不够的。在

^① 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8、18页。有关“批判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区分,可参见黄进兴:《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95页。

西方学术界,参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有史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哲学家等,他们不仅研讨史学的方法、逻辑,还考察史学的表述工具和形式,这似乎表明史学哲学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一般认识论的研讨范围,而需要有一种广义的历史认识论来处理这许多问题,尤其是要对学科的不同层次、不同知识产品及其性质特征分别加以研讨。在这一点上,雷蒙·阿隆的批评是合理的,他认为英美分析哲学家过于看重史学的叙事形式,就会把历史理论局限于叙事理论,结果很多属于历史认识范畴的成分就会被我们排斥在外^①。然而,过于局限于传统的认识论模式,也常常会忽视对历史学科的本质特性的探讨,这也是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后兴起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主要缺陷。

虽然笔者在此领域已有过一番思索和研究,但能够见之于文字的,只能说是一种看法或意见。1864 年,德国哲学家布莱德雷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问世,这是一本被视为开“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之先河的著作。作者在序言中说:“我这些想法为什么要终于刊行出来,那原因就是我愿意并且希望着,它们会协助一些更有能力的人们一劳永逸地清理和处理一个应该加以处理的题材。”^②这一领域的问题,能否有可能一劳永逸地清理完成?这是让人颇感怀疑的事,至少笔者不敢有这样的奢望。以笔者的知识和能力,所能做的工作只是:整理问题,梳理逻辑,找出症结,作点解释,其间也包含一些个人的理解——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看法或意见。其作用大概可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便利和门径^③,故取名为《历史哲学引论》。

著 者

① 雷蒙·阿隆:《论治史》,第 186~187 页。

② 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369 页。

③ 本书作为初学者的一种门径和阶梯,有必要让读者了解本领域的学术争论及争论双方的一些基本观点,为此,本书在正文或注文中,引录了许多学者的有关论述以及一些精彩的论断,引文尽可能直录原用,并注明出处或来源,读者按图索骥,可以进一步阅读这一领域里的许多经典著作和论文。

目 录

序言——历史与理论	何兆武	1
引言		1
一、史学是什么?		1
1. 质疑与批评		1
2. 历史学的科学化		4
3. 彻底的批判与反思		7
4. “史学概论”,概论什么?		9
5. “历史认识论”的兴起		13
6. 何、庞之分歧		16
二、史实与史家		18
1. 历史学的“月亮问题”		18
2. 事实能否自己说话?		21
3. 以事实为中心的史学理念		23
4. 事实与非事实		25
5. 主客体的关联性		28
6. 谁决定了历史的意义		31
7. 有几种历史事实?		34
三、历史的真实		37
1. 历史学的分层		37
2.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39
3. 认知图式与双向建构		43

4. 对符合说的诘难	46
5. 一种弱化的检验	50
6. 历史个别的非同一性	53
7. 历史学的“范型”	55
四、历史的话语	59
1. 什么是历史学Ⅱ?	59
2. 移情与体验	61
3. 历史的“真了解”	64
4. 想象与推理	66
5. 理解的差异	70
6. 历史就是虚构?	73
7. 覆盖定律及其他	77
8. “why”和“how”	79
五、历史的重演	84
1. 科学的尺度	84
2. 个别论与借用论	87
3. 分歧与症结	89
4. 什么是重演?	91
5. 相似与同类	94
6. 历史的重演	96
7. 澄清一种误解	98
8. 历史能否预言?	100
六、历史学的概括	105
1. 从因果性到因果律	105
2. 几种不同的必然性	106
3. 理论陈述的非清晰性	109
4. “相干性”问题	111
5. 测不准和不确定	114
6. 概率问题	117
7. 历史学的概括	120
8. 理有概然,势无必至	123

七、史学的人文性	127
1. 关于史学的评价	127
2. 从柯林武德的一段话说起	129
3. 历史需要不断地改写	132
4. 历史哲学的特殊问题	135
5. 配景论与不可通约性	137
6. 客观性不等于真理性	140
7. 人文界的“实然”与“应然”	142
8. 寻求共享的“应然”标准	145
9. 是法理思维,还是科学思维?	148
八、历史学的用	151
1. 历史有什么用?	151
2. 记忆的自然作用	153
3. 遗忘也是生活所必需	156
4. 历史学的“真”和“用”	158
5. 历史该怎么用?	161
6. 史学的异化和社会良心	164
7. 历史学家的责任	166
8. 谁能遏制历史之滥用	168
基本读本和参考书目	172
后记	179

一、史学是什么？

1. 质疑与批评

说来奇怪，还没有哪一门学科的研究，会像历史学那样，存在着那么多的分歧、质疑和批评。这些分歧、质疑和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历史学能提供怎样的知识产品，是单称判断，还是普遍性命题？它所提供的知识是否确实可靠？是否有客观性？第二，即使它提供的知识确实可靠，即使它获得的知识具有客观性，那么，它们有什么用——历史知识有什么用？任何一门学科以及它的研究者，如果在这样两个基本的问题上遭到他人的怀疑或否定，就等于是怀疑这门学科存在的合法性。

不过，长期以来，史学家们并不太在意这些疑问，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言而喻或理所当然的事情。自从分析历史哲学兴起之后，前辈学者的乐观主义和称心如意才彻底地被搅乱，这两个问题不仅变得严峻，而且难以回答、难以回避。今天，每一位从事这一行当的研究者都会碰到这一类疑问：当历史学家正在滔滔不绝地谈论一大堆历史事实时，门外汉向历史学家所提的唯一问题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法国物理学家、哲学家马尔奎斯·杜·查特理特曾对历史知识感到困惑，她说：

一大堆混乱的无联系的事实，一千个关于不带任何决定性的战争的叙述。一个和我一样的法国妇女有什么必要知道在瑞典埃格利继承了哈奎恩和奥托曼是奥托古尔的儿子？^①

而这一类历史知识，随着历史学的发展还不断地在与时俱增。在今天，

^① 转引自恩斯特·布莱萨赫：《历史、历史学和史学史》，《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0期。

马尔奎斯还可以进一步质问：为什么她要操心关于 17 世纪英国妇女生育率的一大堆资料？为什么她要关心现代美国炼钢工人以及诸如维多利亚资产阶级的家具、法国军队新兵中的痛风病的发病率等历史问题和知识？而这些问题，以及有关这些问题的历史知识在专业的历史著作中比比皆是。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这是让历史学者犯难的问题，即便是终身以史学研究为职业的历史学家，恐怕对此也未必能说出个究竟来，或者如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历史学协会主席、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那样，干脆承认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①。我们可以无视门外汉的质疑，说那是出于对历史学的无知和误解；我们也可以说卡尔·贝克尔在发一时之感叹，是对世人忽视历史经验教训所表示的一种愤慨（的确，贝克尔并非真的认为历史无用）。但是，这里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如果你越是深入去思考、越是对历史学有过一番真切的了解和深入的反思，你越是会陷入一种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

历史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它是不是一门科学，抑或它只是一种艺术。这些在其他学科里不会有的问题，或者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历史学中却充满了疑问与分歧。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在哲学上不首先去探讨认识的本质和能力，而径直着手去认识世界的本质，就好像飞鸟要超过自己的影子，那是一桩完全不可能的事。深受康德影响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将康德的这一观念变为他反思史学的宗旨：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对自己的了解，那么，他对历史的了解总是不完备的。他说：

对历史科学进行哲学的反思，乃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而且严肃的史学必须使自己经历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的批判与洗练。^②

另一位学者曾经这么说：一门学科成熟的程度，取决于它对自己的成果的自觉程度，决定于该门学科用以达到并证明真理的方法的理解程度^③。由此可见，任何一门学科研究，都不仅要致力于认识自己的对

^① 卡尔·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299 页。

^② 柯林武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的观念》（译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第 34、41 页。

^③ 孔阶平：《认识论与自然科学》，《东岳论丛》1980 年第 2 期。

象,而且还要从事于认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虽然是一门古老而悠久的学科,但它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因为,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人常常不能自觉地去反思自己的研究活动,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的性质常常未能有真切的了解^①。

半个世纪前,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谈论“历史是什么”的时候,很担心“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或者提得多余”^②,甚至被认为是“最让人吃力不讨好”的问题^③。当时,分析批判历史哲学的研究在有些国家(如前苏联等东欧国家)被视为一种概念的游戏,是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故弄玄虚。职业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用的问题,而且会增加许多思想上的混乱^④。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卡尔的担心似乎仍然存在,尤其是在缺乏自觉的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的中国学术界,对史学自身的讨论和研究仍然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历史研究者很少,也很不习惯,甚至很不情愿去反思自己的研究活动,反思乃至批判自己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理论、方法和概念的合理性,因为任何反思都足以干扰他们的工作、扰乱他们的平静和自信^⑤。

① 何兆武先生说:如果说以往的历史理论家大多不够重视史实,那么同样可以说,以往的实践历史学家就更加忽视自己的理论思维有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必要,这一点或许是古老的历史学到了近代落后于其他学科的重要原因之一。参见何兆武:《苇草集》,三联书店,1999年,第173页。

② 卡尔著,吴存柱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页。

③ 1972—1973年间,法国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在法兰西学院以“什么是历史?”为题作了一次演讲,讲演的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我讲本课程的中心部分,可能是最让人吃力不讨好的部分,有时候也是技术要求最高的部分。”参见雷蒙·阿隆:《论治史》,第95页。

④ 参见何兆武:《苇草集》,第156页。

⑤ 雷蒙·阿隆曾谈到过史学家与哲学家在有关历史哲学问题上的无法沟通。他认为,只有少数史学家会非常认真地对待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讨论,而大多数的史学家还没能全部走出康德所说的“教条式的昏睡”,他们没能意识到重建历史所带来的问题。参见雷蒙·阿隆:《论治史》,第29~30页。就笔者所见的材料来看,这种缺乏反思态度的现象,似乎并非中国史学界特有的现象。陈新的译作《当代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收入了理查德·汪的《转向语言学:1960—1975年的历史与理论》一文,其中说到历史哲学的研究在世界各国都不甚被注意的情况,原文如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相当程度上甚至到今天,几乎在任何地方,历史哲学都是一个学术孤儿。在荷兰,它被当作指导历史学研究的常规部分讲授;在美国,大多数历史学系将这门学科限制在历史方法论导论性质的研讨班内,将它委托给一位愿意分担研究生新生指导重任的在职教授来主持(极少数系例外,他们有人对这门学科有着特殊兴趣);在英国,历史学的研究生通常自由选择专业,一些人踌躇地进入历史哲学专业,但是,当他们依旧对专业中任何形式的反思无动于衷时,(像大部分历史学家一样)照样不会受罚。

其实,讨论史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并非是为历史学争得一个科学的头衔和称号,而是借助对这一题目的讨论,使我们能够明白历史学大概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因为,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清楚历史学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才能明白历史学者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能够期待历史学什么,不能期望它什么^①。

2. 历史学的科学化

在西方学术史上,历史学从她诞生之日起,就未被人们视为科学。在古希腊时期,科学是一种求得“真知”的学问,历史知识不属于“真知”,历史学也就不属于科学。这样的划分,并不是古典时代的人们有意要贬低历史学的作用和价值,相反,史学与“诗”并立,由缪斯女神之一克丽奥女神司职,地位崇高,职能神圣^②。古典时代的史学家,看重的是史学的艺术性功能:它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智慧、提供道德评判的依据。那时,历史学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也不会因为历史学不能提供“真知”而烦恼。

古典时代结束以后,历史学的地位也随之改变。史学成为神学的一个分支,它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在世俗世界的历史里论证宗教神学的合理性,为其作佐证和诠释。如果那时有什么科学的话,那么,承当这种责任和使命的研究学科,都是最重要的、无可怀疑的科学,史学的地位不仅崇高,而且神圣。

自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后,科学才有了特定的含义,并成为一切学问的成功典范。见贤思齐,历史学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新的期望

^① 雷蒙·阿隆曾说:“我在当时和现在一直在用康德的三个问题来表述这一思考:Was kann ich wissen? Was soll ich tun? Was darf ich hoffen?”(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有权期望什么?)参见雷蒙·阿隆:《论治史》,第16页。

^② 美国历史哲学家A·斯特恩认为:“对希腊人来说,历史编纂学是对各种事实的估价,是一种对被认为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光荣的事件的选择。这种选择预先假定一个价值的概念,是历史学家头脑中的各种价值的等级序列。希腊的历史学家们有意识地使用了这个等级序列。……历史编纂学从一开始就不可辩驳地与价值的领域连结起来,正因为如此,它常常被责备不公平和缺乏科学的普遍性,因为价值的判断是主观的和多变的。……对希腊人来说,这种境遇无论如何是不应受到指摘的。反之,挂满桂冠而且分配光荣与谴责的克丽奥在他们眼中在履行着一种庄严的职能。”(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338~339页)